

学海任遨游,甘苦寸心知

——陈毓罴研究员访谈录

孙丽华

陈毓罴先生,湖北武汉人,1930年生。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兰州大学中文系助教,1955年10月,入苏联莫斯科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部学习,专业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959年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80年起长期担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现任该会顾问。1985年至1991年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2006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特别着重于《红楼梦》研究。与刘世德合著的《曹雪芹佚著辨伪》于1993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专著有《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等。本刊特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丽华博士对陈毓罴先生进行学术访谈,并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读书与大学生活

孙丽华 陈先生,当年在您门下读书时,我就听您说过,您出身于教师家庭。那么,以您的家庭情况而言,接触文字应该很早,您在少年时代都读的是什么样的书呢?

陈毓罴 少年时代我受父亲的影响很深。我的外公张鹿笙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我父亲是外公的学生。后来在一所女子中学任国文教师,那时我家住在汉口。父亲是一个爱书的人,很喜欢买书,所以我家的书很多。在我幼年时,父亲就有意识地引导我亲近书籍。有时让我帮他整理书籍,他在一旁指点,告诉我怎样给书分类,并讲解一些书中的内容和掌

故。父亲也很喜欢京剧,小时候我常随他去看戏。家里收藏有很多戏曲和小说,我初次阅读的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之后又读了《水浒传》。这本书我非常喜欢,觉得那些英雄好汉十分豪爽。我当时贪读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废寝忘食。记得小学时读过的小说有《西游记》、《说岳全传》、《儒林外史》、《荡寇志》、《粉妆楼》等等。父亲还指导我学习古文,要我阅读背诵《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学《左传》时,父亲还特意为我找了一位老师,是湖北有名的藏书家徐行可的儿子徐孝定。上初中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课后都去他家中,由他为我讲解《左传》。每次两小时,一直到全部学完。徐孝定家学渊源,学问很深,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我家的线装书也很多。有《十三经注疏》、《史记》、《御批通鉴》,还有唐宋名家的诗集,也有《聊斋志异》、《浮生六记》、李渔的诗文集等,我都有所浏览。除了这些古籍,我也很喜爱新的中外文学书籍,像《鲁滨孙漂流记》、《宝岛》、《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张恨水的小说等。最喜欢的是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巴金的《海行杂记》,还有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爱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书,是父亲送我的一套中华书局的丛书《初中学生文库》,这是一套百科知识读物,文化、历史、天文、地理、动植物无所不包,令人眼界开阔。学生时代,在课余时间我最有兴趣的事情就是阅读。除了家里的藏书,同学之间也互相借书。我的姐姐长我五岁,我上中学时,她已经上了大学,有时带回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给我读。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内容非常悲惨的小说,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的《真妮姑娘》。

上初三的时候,我已经能够顺畅地阅读未加标点的古文。父亲认为写作很重要,是对人思维能力的一种梳理和锤炼。所以他很早就要求我动笔写一些尺牘、札记、论说等简短的文章,还教给我怎样做古体诗词。在父亲悉心指导下,我对于写作兴趣大增,渐渐掌握了一些写诗作文的要领。家里曾经订阅了开明出版社的《中学生杂志》,我很爱看叶圣陶、夏丏尊开设的《文章病院》专栏,里面分析评点了各种语病,对我很有启迪。父亲每天晚上都要批改高中学生的作文,我有暇就在一旁观摩,感到获益匪浅。抗日战争燃起,有一段时间为躲避日寇轰炸,我们全家人一同逃难到乡下去。闲居无事,我就教几个堂弟妹读古文。这应该算是我最早的教学活动了。还有一桩趣事是在我上高二的时候,父亲以前的一个学生那时已经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来我家看望老师。闲谈之中说到她的一个女同学快结婚了,为了祝贺新婚,她想送一副贺联,但只想出上联:“画眉好仗凌云笔”(新郎是位空军飞行员),苦思有日,却一直想不出合适的下联。我从旁听到,就为她代拟一个下联:“赌茗终输咏絮才”。她大为高兴,欣然采用。并夸赞我的下联既用了夫妻和谐之典,又暗寓一层首肯女子才能的意蕴,很是贴切新颖。

在汉口法汉中学读高中时,我有两个很好的国

文老师。一位是贺苏,教我们古文诗词等。贺老师最擅诗词,后来做了湖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到了高三,换了国文老师。新来的余文老师抛开既定课本,给我们讲起了新文学。记得他在课堂上讲过何其芳的《画梦录》和新诗、贾芝的诗《播谷鸟》,还有艾青的《火把》、天蓝的《大队人马回来了》等等,此外还介绍过屠格涅夫、泰戈尔、高尔基和鲁迅等人的作品。同学们觉得余老师的课新颖活泼,听得兴味盎然。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位余老师是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是董鲁安(后改名于力)教授的研究生。曾担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干将。1937年去延安,是“鲁艺”第一期学员,何其芳的学生。后来因为养病回到武汉。我受这位老师影响很多,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启蒙,他曾借给我一部《鲁迅全集》,我也认真地阅读一过。

初中和高中的学习生活一直充实而愉快,高考时我选报了文学专业。在当时很少有人会报这种专业,大家都比较愿意报考经济和工科。我完全是从自己的志趣出发。而父亲也很尊重我的选择。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一直持这样开明的态度,从来不搞家长权威。这是让我非常感念的。

1947年我高中毕业了,同时报考了几所大学,为的是增加成功的把握。抗战结束之后,沦陷区有许多失学青年都来参加考试,入学竞争相当激烈。因为报了几所大学,我考大学一共考了七天,每天都是早上四五点钟起来,步行到江汉关码头,乘轮渡过江,再赶赴武昌考场,很是辛苦。后来北京大学和另两所大学都录取了我,我当然最想上北大。这不单是因为北大名气响,还因为上北大我可以获得奖学金。这是让全家人都感到欣慰的,因为我父亲久已失业赋闲,根本就负担不起我读大学了。

当时南北隔绝,铁路不通,我在汉口乘一艘小货轮“大生号”直下塘沽。17岁的我还是初次离家,百感交集,写了一首小诗抒发胸怀:“华灯闪烁暮云横,回首江城别憾生。惟有珞珈山上月,不辞万里伴同行。”

大学一年级是在北大四院,那里原来曾经是“贿选总统”曹锟的国会所在地。二年级我们搬到了沙滩红楼。当时的北大名师济济。我大一时的国文老师是杨振声,读书指导的老师是赵西陆,中国通

史的老师是余逊。课程设置也很丰富,记得我选过的课目除了文史类的专业课,还有英语、政治学概论、地质学概论、哲学概论等课程。因为当时学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是要求学生们文理兼通。北大的图书资料相当丰富,除了学校的图书馆之外,还有学生自办的图书室,都是同学们自己的书,拿出来供大家借阅。有许多新书和进步书籍,我曾经从中借阅过《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那时北大的学生运动非常活跃。我参加了学生社团“世纪潮”,1948年10月,又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我们经常上街搞活动,游行示威,发传单,鼓动罢工、罢市、罢课,反饥饿、反暴政。

自二年级开始设立专业课,中国文学史的老师是游国恩,音韵学老师罗常培,中国语言的老师是魏建功,专门课有词学,由俞平伯主讲,曲学老师是吴晓铃。大三就到了1949年,开的课有文艺学,老师是杨晦,还有新文学史,老师是蔡仪。讲《水浒传》的老师是郑振铎,民间文学的老师是钟敬文。还有游国恩的“白居易诗”,吴晓铃的“元明清文学史”。

进入大学,我仍然保持了多年养成的勤读书、勤写作的习惯。到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天津的《进步日报》上的《粤东义勇檄文考》。原文是我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抄本里面发现的,是鸦片战争期间广州的民众组织“社学”抗拒英军入城的战斗檄文,作者是钱江和何大庚。当时这篇文章久已失传,更不知其作者,我无意之中见到这篇文章的手抄本,觉得很重要,写了很长的考证文章。我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论文《歌谣与政治》,谈古代的民谣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还有一篇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考据文章。在曲学课上,吴晓铃老师要大家填曲,许多同学们喜欢摹拟那种哀婉的风格,我却独辟蹊径,放笔抒写革命事业,歌颂新社会,被吴晓铃老师誉之为“有刚健清新之致”,予以高度首肯鼓励。到1950年,北大召开全校的“学习经验交流大会”,我被系里推荐在大会做典型报告,介绍自己学习心得和经验。

我的毕业论文最初想写晚清小说,但感到资料的搜集准备需要很多时间,恐怕不易做好,就又改为《中国笑话试论》。论文由游国恩先生指导。有关材料很丰富,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游先生为我

写了介绍信,我就可以进入北大图书馆的“马氏书库”(马廉先生藏书),库内设有书桌,我每天去阅读。我看过冯梦龙的《广笑府》、赵南星的《笑赞》、陈继儒的《山中一夕话》、石成金的《笑得好》等,还看了一些明清的戏曲和小说,这些收藏量浩大而种类繁多的书籍资料让我眼界大开,对我的论文写作裨益不浅。不由得十分感佩马廉先生的资料积累工作。在学术事业中,我们都需要得到前辈学人的沾溉扶助,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是“前人栽树,后人纳凉”啊。那时钟敬文先生也供给我所搜集的大量民间笑话书。我就把这些古今笑话做成卡片,进行分类,再做分析比较,并就中国的讽刺艺术进行分析,写得十分用心,在全班我的论文获得了最高分。

永难忘恩师言传身教

孙丽华 早年的大学不只重视对学生传授知识,也特别注重养成良好学风,以及老师对学生人格的陶冶。北大这样传统深厚的学校,在这方面一定也给您留下不少回忆吧?

陈毓罴 我的许多老师,都让我难以忘怀。当年师生之间融洽相处的日子,回想起来,真是历历在目啊。像我们的一位老师马廉先生,是著名学者,学养非常深厚,对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多有建树,尤其积累了丰厚的藏书。抗战前他就在北大教小说史,为教导后学付出全部心血,一直到在课堂上发作脑溢血而辞世,可以说是一直坚持在教学岗位上。吴晓铃先生是他的学生,后来给他当助教。马廉先生故世以后,吴先生精心整理老师捐给北大图书馆的小说、戏曲藏书,由此建立了北大图书馆的“马氏文库”。吴先生的为人,也非常笃厚谦逊。早年在协和医科大学读书时,他曾听过郑振铎先生的课。许多年后郑振铎先生来北大开《水浒传》课程时,已经身为教授的吴晓铃先生仍然对郑先生恭执弟子之礼,替郑先生写板书,并恭聆授课。这些老师们的嘉言懿行,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们莘莘学子的心灵。记得当时的校园生活是那样快乐温馨,老师对我们关心爱护,期望殷切。师生之间真是平等宽松如益友,和睦亲切如父子家人。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全班同学都轮流

写班里的“生活日志”,它很像一份众手编排的班级小报。行文不拘一格,或记事,或抒情,或议论,百花齐放,丰富活泼。那时我们也请老师参加。现在我手边还保存了一册这样的日志,前些时候取出来翻看,发现里面还有杨振声先生亲笔书写的毛笔小楷一页。时间是1949年12月15日:

晨起晴空丽日,真是好天气也。昨夜二时始睡,荒唐荒唐!今晨未及洗脸,蒋维屏同学来,请其共早餐,强而后可。蒋同学去,李绍广、李嘉训二同学来,欢笑如一家人。早晨便这般轻松地过去了。客去赶写文章,幸得四时交卷。腰腿床上一伸,歇一回子罢。不好,要睡,还有工作呢!“起来,起来”,“再少躺一回。”“拍,拍,”可是有人敲门?“请进”。……

晚饭后预备一回功课,已是十点多,怎这般快!拿起《生活日志》从头看来,这里是一颗颗青年的心,在跳动,在申诉,在希望向上,在要求完美。他们将来有的会成为学者,有的会成为作家,有的会作很好的教员,有的会为人民作些事业。虽说是每人不过短短数行,这里已藏着将来花果的种子。是谁这般机灵,发明这“生活日记”?历来日记是孤独的自诉,或者是孤芳自赏。这里却把一颗颗的心联在一起了,它比坐在树荫下谈心,或雨窗夜话,都更能赤诚相见,这里是日记的生命。

另一种感想使我不禁慨然,好学生值得学校骄傲的,可是这责任,实在太严肃了!

尘世沧桑倏忽六十年,重睹先师遗墨,心情怆然。然而一股暖意亦盈盈而起,我更加深切地感触到老师们当年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所持的那一腔期望、挚爱之心。师长们不但为我们传道授业,也为我们付出了如此深挚的关切盼待之情怀。这种深情厚谊,是老师们留给我们的又一份珍贵资产。对此我是永志不忘的。

北大的老师授课富于独创性。四年级的时候,魏建功老师为我们上“应用文写作”,课讲得生动而有分量。老师还提供他日常积累的丰富材料给学生参考。老师针对《人民日报》上的“中国第一”专栏的

文字“挑错”,还带领学生去故宫博物院,评点那里的说明词和标示牌。这种教学方法生动又实用,可以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和勤于思考、大胆质疑的精神。老师还让同学们分工,按照拟稿、修改定稿、审稿、誊抄、发稿的流程,全班合作来完成一份公文。在北大的时候,老师总是这样引领大家积极主动地学习,鼓励同学们自学、搞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高校教师生涯与留学生活

孙丽华 从北大毕业以后,您曾经在高校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上个世纪50年代,应该是大学的文学史课程转型的时期。您在学生时代所接受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民国时期的格局,和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初出茅庐的您,在当时讲授这样一门课程,就很有一些“开辟草莱”的意味,不知您在讲授文学史课程时,面临过怎样的挑战?

陈毓罍 1951年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兰州大学。我在兰大做了三年助教。头两年作系秘书的工作,处理日常事务,兼管图书资料室,年终还要代系主任写工作总结。学校平时有许多政治学习,还下乡参加过土改运动。总之当时运动很多,让人总觉忙碌紧张。到了第三年,形势变了过来,运动告一段落,学校开始抓学习。因为缺乏师资,系里竟让我担任大四的文学史课程“宋元明清文学史”。当时我大学毕业没有多久,要给大四的学生开课,心里也不免有些惴惴。但还是知难而进,开始认真准备。一方面,认真地参考一些比较好的文学史教材,例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另一方面,广泛地收集材料,兰州图书馆里有很多旧杂志,我大量浏览,把有关文学史方面的文章都做了摘要;第三个方面就是注意对文学史上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简单地因袭前人之成见。就这样,我在23岁时登上大四的讲台。虽然自己心里挺紧张,但是学生的反响竟然非常好。我在兰大时期的老同事常振江前些日子来信,还生动地回忆当年情景,说我的课:“甫经推出,就在学生中间深得好评,认为与老先生们刻板单调的授课不可同日

而语,内容丰富,观点鲜明,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此情此景,如在眼前。”

当时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很多老教师只是在做作家作品的介绍,而缺乏史的眼光和对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考察。对学生而言,这好像和上语文或写作课没有什么区别,故而兴趣不高。我当时并不在课堂上带着学生读作品,而是事先印发油印的讲义,让大家预习,上课时则重点介绍一个时代的文学特点,某一作家的创作发展道路,进行知识的分析综合。让大家能够寻绎到文学史的脉络,并为他们的深入学习引领方向。所以学生们感到有收获,愿意上我的课。当时还出了一桩趣事,授课之中,我因参加留学苏联的考试请假一个月,系里就让外校的一位老教师代课,但不久学生们都跑到系里要求让我快些返回上课。记得当时我的课,以介绍苏轼的那一部分最获好评,还有关于陆游、宋词、《西厢记》等章节,反响都很好。清代的小说以对于《聊斋志异》的讲授最有兴味,在这些备受好评的讲授里,其实都凝聚了我多年治学的心得。

孙丽华 在兰州大学的时候,您曾经得到一个难得的留学机会——赴苏联学习文艺理论和俄罗斯文学。这一段青年时期的留学经历,您一定有许多不同寻常的收获和感受吧?

陈毓罴 那是在1954年夏天,兰大推荐我参加留苏研究生的选拔。考试在西安进行。当时我住在招待所,没有地方用功,所以每天都去附近的莲湖公园看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最难忘的一件事》。我就以自己初出茅庐的讲课经历做了素材。有对于登上讲台的前夜既兴奋又紧张心情的细致描写,也穿插了往事的回想和对未来的期待。后来得知阅卷人是北京大学的林庚老师,对我的作文评价很好,给了满分。我被录取以后,1954年秋天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学俄语,林庚老师还让我的北大同学,当时已经留校做他的助教的陈贻炯来找我,我这才去拜见了初次识荆的林老师。老师说我的作文感情真挚,文字流畅而自然,对我颇予嘉许。留苏考试的其他科目还有《联共党史》和《文艺理论》。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当时刚译出不久,我认真阅读研究一番,对苏联文艺理论的格局颇有一些领悟,所以也考出了好成绩。我的考试能够这样顺利,其实与我

教过文学史有关。以我的经验而言,搞教学可以使人深入细致全面地学习,可以牢固地把握一门知识的体系和脉络。

我于1955年秋季赴苏,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作研究生,专业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重点研究契诃夫。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中国研究生1954、1955两届共有十儿人,每人研究一位作家,互补性很强。教研室开会时,我们总是坐在最后面一排,因而有教授戏称之为“中国的万里长城”。苏联大学研究生的学习特点是比较注重哲学的学习,注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入学第一年,我们阅读了许多马列经典,包括《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国家与革命》等。中国研究生四个人一组学哲学,结合阅读展开讨论,这种方式提高比较快,有老师指导,又可收互相切磋之功。第二年开始学习专业,除了听导师的大课外,更多时间是以自学为主。老师先发下参考书目,有好几十种,洋洋大观,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研究著作都有。半个月见一次导师,可以向他提出问题。学生如果提不出什么问题,导师就向学生提问。我的导师是文艺理论家、俄罗斯文学史专家波斯别洛夫教授,德高望重,平易和蔼,循循善诱。对我的每一个进步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老师把他的各种著作一一赠我,并且常让我将他刚完成的论文手稿带回宿舍细读。他论文中的严密论证和强大的逻辑力量,让我很钦佩,我从老师那里获得很多教益。

因为我在俄语专科学校只学了一些普通会话,所以在专业学习中遇到很多困难,俄语学习分量也很重。我首先看作品,理解分析思考,之后再看研究著作,一边与自己的想法对比,发现有些地方是自己没看到也没想到的,这样就加强了认识。再把各种研究著作加以对比,就能够更深入全面地认识一个作家,同时可以看到各个研究专家之特长与不足。阅读文学作品时,开始生字很多,需要不时查阅字典,过了一年半以后,一本厚厚的字典已经被我翻看得又旧又破。而阅读渐渐变得顺畅,基本无须依靠字典。以后的一个时期,几乎每天都去列宁图书馆阅读全苏有关契诃夫研究的学术论文,觉得兴味盎然。

在莫斯科大学的学习很艰苦繁重,但生活条件很好。一个人住一间宿舍,还有可以沐浴的卫生间。大学的餐厅很整洁,餐桌上总是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鲜花。下午4时以后,我们在地下室的茶点部喝茶,还可以买到“西伯利亚饺子”。这种饺子与中国的不同,是要蘸着黄油吃的。莫斯科天气寒冷,窗玻璃都是双层的,窗子下面有一个像抽屉一样的装置,拉开它就可以通风换气,既保暖又能输入新鲜空气。莫斯科大学的环境相当优美,位于列宁山上,堪称是宫殿式的建筑。园林型的环境典雅宁静,是一个难得的求学圣地。暑假学校安排留学生去莫斯科郊外的休养所,寒假大家就去学校设在山里的生物站滑雪,这些经历都留给我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在学业之余还参观过托尔斯泰庄园,去过列宁格勒见识“白夜”,还去过黑海之滨的里加。文学系的中国研究生办了一个墙报《东风》,因为大家觉得搞文学研究的人也应该懂得创作。我是编辑之一,自己也投过稿。我写过一篇幻想散文《俄罗斯古典作家夜访列宁山》,虚构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文学大师在圣诞夜乘坐三驾雪橇来到列宁山与我们对话。我们的墙报张贴在宿舍入口处,每期都有好多中国同学来看。还出过俄文版,供苏联同学欣赏。

苏联有丰富的文学传统,小说作品很多。我读过的小说里,比较喜欢费定的《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和《篝火》,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草原上的田庄》和《为了苏维埃政权》,还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留学经历开阔了我的眼界,感到俄苏文学内蕴丰富,是个宝藏。留学生活收获颇丰,也激发了我“引水灌田”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愿望。

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孙丽华 进入文学研究所以后,您参与了编写《中国文学史》。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一部文学史,撰写者努力尝试将新的理论眼光和研究格局引入中国古老的文学累积层。这部文学史问世之后,受到高校师生以及社会人士的广泛好评,曾经给予几

代人以深刻影响。它的出现,填补了自20世纪初期以来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一直期待一部较为成熟的、具有完整知识体系的中国文学史的空白。这样一件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应该说很有压力了。不过,以您在兰州大学教授文学史的经验和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文艺理论的积累,承担这样的任务还是有所准备的吧?

陈毓黈 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四年,1959年秋天我回到了祖国。回国后,我还是想继续搞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特地上书留学生分配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何其芳时任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接纳了我。1960年,我参加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那年我刚满30岁,参加了编委会。编写的内容一共分为三大段:从上古到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我参加的是元明清部分。主要写了关于《西游记》、《西厢记》、《琵琶记》、《长生殿》以及有关前后“七子”、李贽、公安派、竟陵派的内容。《西游记》这一章写出后,受到何其芳同志的赞赏,打印稿送到北大征求意见时,又获得吴组缃先生的称赞。2005年同事曹道衡去世时我曾经写了这样一副挽联:“修史共青灯,犹记当年豪气;著书盈白屋,弥知晚岁壮心。”主要就是回忆我们共同度过的这一段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难忘岁月。回想当时我们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热情和文学所的老专家们一起,共同承担这一项需要付出许多开创性努力的庞大工程。

孙丽华 文学史是对于古典文学的全面扫描和叙述,您也做了许多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而深切的感受呢?

陈毓黈 完成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之后,我比较投入的一个课题是关于《西游记》的研究,一搞就延续了许多年。这方面的论文有《从过火焰山看吴承恩对情节的处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1963)、《吴承恩〈西游记〉成于晚年说新证》(同上,1984)、《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考辨》(《中国文化》1996年第13期)等几篇。

对于《西游记》,我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应该重视吴承恩对于《西游记》成书的贡献。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等这些早期作品到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其实是一个巨大的

飞跃。我不同意那种简单地套用“民众口头创作、漫长时间积累”的固定模式去解释《西游记》成书过程的论点,因为那样的话有许多问题得不到解答。吴承恩不会是简单地记录、整理已有的文学素材,来写出《西游记》的,而是在原有的故事格局之上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改造和创新。例证之一是,我从《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中发现铁扇公主所持的真是一把铁质的扇子,也不能够变化,是吴承恩把它改造成为“芭蕉扇”,这样更吻合扇子的持有者是一个弱女子的人物特征,而且还让这个芭蕉扇忽大忽小,可以伸缩,就更富有神奇的艺术表现力。类似于芭蕉扇的能长能缩,金箍棒也是可大可小,这一情节也是出自吴承恩的创造。

在《西游记》中还有很多故事情节上的增添和改变,是与吴承恩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的。例如我考证出吴承恩曾经做过长兴县丞,是个八品小官,帮助知县处理公务,管钱粮和马政。当时朝廷把军马都交给地方编民饲养,养得好是马户本分,如若饲养不当,马匹病死,就会受到责罚。显然这是一个动辄得咎的苦差使,永远无功有过。吴承恩会有许多积郁不满,他把这些委屈赋予了孙悟空。在《西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孙悟空也在养马,玉皇大帝对他的功劳并不重视,连蟠桃宴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最后孙悟空愤然反出天门。这些情节应该说寄托了作者本人的不满和想象。而在《取经诗话》与西游杂剧中,均无孙悟空在天宫养马的情节,很明显,这个情节是吴承恩的创造。还有,吴承恩做县丞时,他的上司是县令归有光。两人或许由于个性相左,合作一直很不愉快。吴承恩个性诙谐通达,归有光则拘谨迂执,这样的两个人相处显然不容易和谐。后来吴承恩遇到了麻烦,被诬告有贪污行为,归有光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出来为吴承恩辩护,而是保持沉默。吴承恩最终是被撤职,赋闲归家。那么我们可以从《西游记》中唐僧与孙悟空这一对师徒身上,看到归有光和吴承恩关系的投影。唐僧作为领导者,能力并不高,却一味苛责劳苦功高的徒弟。尤其是他根本不信任自己忠心耿耿的徒弟,却偏听轻信妖怪的谎言,毫不留情地赶走了孙悟空。许多人读到这些情节,会感到难以理解,弄不懂唐僧为什么这样不近情理。但是我们如果把作者的创作和他的生活

经历结合起来,就很容易理解小说中潜藏的寓意。以及作者为什么在唐僧身上寄托这么多消极的性格特点,诸如轻信、胆小、在危急关头容易翻脸无情等。有一种解释说这是为了渲染小说的喜剧色彩,抑或是为了更加突出孙悟空的英雄气概,可是,如果单单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说服力显然是不足的。我还考证了吴承恩写作《西游记》应该是在他长兴县丞卸任之后,在荆王府纪善任内所写,故为晚年之作,时年大约在62岁左右。

孙丽华 您对《西游记》的研究,听来的确是饶有意味。想当年您还是小学生时,已经开始接触这部古典文学杰作,人到中年,又着手研究它,不能不说与《西游记》有很深的因缘。固然在后来的研究里,您才真正对作品有了深入的和理性的认识,但是早年的童心阅读,犹如高翔的羽翼,始终引领您遨游在神奇浪漫的精神空间。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您对《西游记》的研究总令人感到熨贴而传神。

从您的治学路径来看,是属于乾嘉朴学的路子,立论从不轻出,必建立在充分的资料研究的基础之上。在您对《西游记》的研究里,我已经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上个世纪60、70年代,您主要的攻略对象应该是《红楼梦》的研究。当时围绕曹雪芹的身世、经历有许多争论,是您与合作者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廓清了这些疑点重重的问题,为以后的红学研究扫清了道路。有关《红楼梦》的研究是怎样进行的,能谈谈其中甘苦吗?

陈毓罴 对于《红楼梦》进行研究,最初是作为一个任务而接受的。周恩来总理有指示:“曹雪芹是我国的伟大作家,《红楼梦》是不朽的作品。我们应当好好纪念他。应当搞一个展览,应当弄清他的生卒年代,应当举行一个盛大的纪念会。”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首先就需要确认他的卒年。当时有两种看法,俞平伯认为是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周汝昌、吴恩裕等人认为是在癸未除夕(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4年)。这样我们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弄清曹雪芹去世的确切年份,作出一个大体可靠的结论。我们首先充分地占有材料,查阅了曹雪芹的朋友敦诚、敦敏的诗文集,仔细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抄本。有关的各种资料几乎逐个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当时,下如此细致的功夫还

是少有的。见解不同的双方一直在争论,那时我们比较年轻,30岁出头,对方都是年长者,然而争论起来都很认真,各执己见,毫不退让。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心得,曾经写过三篇论文,反响很大。其中两篇还被内蒙古大学中文系采用作写作课的范文。1962年,中宣部和中国文联联合举办一个座谈会,请意见不同的两方各抒己见。会议由茅盾主持。在这次座谈会上,吴恩裕坚持“癸未说”,又补充了源自香山的一个民间传说。说癸未年是“秃尾巴年”,即没有大年三十,并说曹雪芹去世的除夕之夜下了雪。座谈会之后,我做了细致的调查。查阅了清代的万年历《御定万年书》,知道乾隆二十八年不是什么“秃尾巴年”,有大年三十。又查阅了当时的皇家观象台的气象记录《晴雨录》,发现癸未年除夕也没有下雪。还有乾隆的御制诗中相应时间里的作品,均未提及是年除夕有雪。做完这些调查研究工作,我把结果写入报告。后来举行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活动,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就定为壬午既乾隆二十七年了。以后在各种展览里的一些说明介绍性文字,都持乾隆二十七年看法,不过也补充一条,提及“另一说为卒于乾隆二十八年。”这基本已经成为定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后来1978年在通县发现曹雪芹墓石,上面所镌刻的卒年也是壬午年,这样我们的结论就得到了一个验证。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了一些所谓曹雪芹研究的“新材料”:两幅所谓的“曹雪芹画像”和名为《废艺斋集稿》的“曹雪芹佚著”。学术界对它们的真实性一时无法确定。对此我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考证。写出两篇论文《曹雪芹佚著辨伪》和《曹雪芹画像辨伪》。这两篇论文是与刘世德合作的。比较重要的一篇论文是《曹雪芹佚著辨伪》。

所谓“佚著”里有一篇署名敦敏的《瓶湖懋斋纪盛》,写一次朋友们的聚会,曹雪芹还表演了放风筝,所放风筝是他自己制作。文章里所提到的参与者像董邦达确实有其人,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吴恩裕等人认为这是重大发现。但也有人觉得有疑问,因为感到它的文字风格不像是乾隆时期的。不过只凭感觉还是不足为证,必须拿出确实的材料。当时我们感到这个工作难度很大,很难找到突破

口。我和刘世德去了许多地方,在故宫博物院还看到了原本的《晴雨录》,还有乾隆的《御制诗文集》、《爱新觉罗宗谱》等等。《纪盛》中所提及的敦敏的堂弟敦惠,而且腿有残疾。但在宗谱中,却无有此人踪迹,只有一个敦慧,而在“盛会”之时他尚未出生。这个敦慧据宗谱记载曾经做过皇家侍卫,故此他不可能是个跛子,也不可能向曹雪芹学习制作纸鸢,作为“宗室”,他绝不可能被挑选进内务府充当匠人。从敦敏的诗文集来看,此一盛会举行的时间距其母去世尚不满一年。还处于守制期间内(当时要为父母之丧守制二十七个月)。所以这次“盛会”很可怀疑,因为按照常规,守制期间作为孝子必须闭门谢客,停止交游,也更不应该在广场上大放风筝,进行娱乐。我们通过多方面的分析比较,完成了“佚著”的证伪工作。

还有一篇论文是《曹雪芹画像辨伪》,为了解决两幅流传的署为“曹雪芹先生小照”的画像的真伪判断。也是通过对众多材料的研究分析,得出结论,这两幅画像都不是曹雪芹的,一幅是乾隆年间的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一个幕客俞瀚的像,另一幅的像主是金梯愚,都有确凿的证据。如果这两幅画像真是曹雪芹的,从画像上的题词来看,那就意味着曹雪芹晚年曾经游幕金陵,是两江总督的座上客,并且与地位尊贵的皇八子以及一大批高官、状元、翰林等社会名流也有着密切的交往,而这两点,在曹雪芹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有诗,描绘曹晚年的贫困生活是“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又描绘了曹雪芹身后的寂寞萧条景象:“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这根本就不像有众多高朋贵友的状态。因此鉴定曹雪芹的画像,不只是一个判断文物价值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对曹雪芹身世经历的了解与其思想性格的认识。

《曹雪芹佚著辨伪》的论文写好后,好几年都无法刊发。直到“四人帮”垮台,这篇论文才有机会在上海的《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号(1978年7月)发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海内外专家称赞。时居香港的当代儒学大师徐复观对这篇论文给以高度评价。论文写好以后,也曾向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小说戏曲权威孙楷第先生请教,老先生还特意给我们写

了一封信,非常风趣地把我们的论文比做《封神榜》里面的“翻天印”,能够让许多浮妄见解无处藏身。这篇论文在1993年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孙丽华 您的《浮生六记》研究成果斐然,享誉海内外。有一些突破性见解,例如搞清作者身世和作品写作的地点等重要问题,您是怎样进行这些研究的?

陈毓罴 对于《浮生六记》,从我少年时期就非常喜爱,1980年6月被邀请参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我提出的论文就是《〈红楼梦〉与〈浮生六记〉》。以后也一直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198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有一次去哈佛大学讲演,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了有关清代嘉庆十三年使团出使琉球、册封琉球国王的报告《续琉球国志》和琉球一方的档案《历代宝案》,让我喜出望外。当时适逢暮春时节,走出图书馆,街道两旁的玉兰花正悠然绽放,暗香浮动,恰似充溢在我心中的愉悦之情。我在对《浮生六记》的研究上作出的主要成就是,确定了这部作品的写作地点。沈复写这本书是在作为“从客”随使团出使琉球期间,当时他随同使团住在那霸的“天使馆”,滞留时间长达四个半月。我也在《元和县志》上面找到了沈复在琉球期间所做的两首诗。在这个方面是发前人所未见,基础建立在资料的考证之上。

孙丽华 《浮生六记》作为一部质朴平易的纪实性散文,罕见地记录了一对普通人夫妻的日常生活,不但描写了他们的坎坷不幸的人生经历,也传达出他们的真挚情感,令人为之怆然。此书乍看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可比性,您却独具只眼,看出它在抒写真情、反抗礼教束缚等方面,实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堪称是体现中国近世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坛双璧,未可多得。所以,不仅对作者身世和成书情况的考证,对作品本身的诠释您也有独到见解。

陈毓罴 在我的专著《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里,是把沈复、陈芸作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的参照人物来定位的。虽然沈、陈是现实中的人物而贾、林是虚构的文学人物,但是这两对人物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抗拒世俗之见的侵

蚀和礼教的束缚,要求个性的舒展和自由,追求一种具有情趣和美感的人生,在感情问题上,看重双方精神上的契合融洽。这些人生价值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小说《红楼梦》里,贾、林未能结为连理,成为爱情的遗憾,而现实生活中的沈、陈却由表兄弟而成为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们那种坎坷穷愁又相依为命的贫寒而温馨的婚姻生活几乎就是贾、林未能实现的婚姻前景的写照。

《浮生六记》是沈复生平交游的具有文学性的实录。它是真实的,在人物的塑造,言行神态描写方面又富有文学色彩,写得细致生动,极具感染力。俞平伯先生曾盛赞此书文笔之轻灵清新:“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托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1923年,北京霜枫社《重刊〈浮生六记〉序》)沈复一生喜好淡泊自然,无论对诗文写作还是园林鉴赏,他都推崇天然的美,认为能够削去斧凿之痕,“人工而归于天然者,为第一”(见《浮生六记·浪游记快》)。这种美学追求与曹雪芹也是一致的。

我认为《浮生六记》应是实录之作。例如书中提到苏州当时有一个名妓冷香,陈芸很欣赏她的女儿憨园,曾一心想为沈复谋为妾室,两人还结拜了干姐妹,交往甚欢。我在当时的《吴门画舫录》一书里,找到有关冷香母女的记载,可见并非虚构,而是实有其人。从方志里也可以找到沈复任幕僚曾经效力过的那些知县的姓名和行迹。沈复一生贫寒,不得不依人作幕,心情是很压抑的,相濡以沫的爱妻又不幸早逝,给予他很大打击。他经历坎坷,四处漂泊,无家可归,以痛苦的心情写了《浮生六记》这样一部回忆录,感情真挚而文笔自然,是产生于清代后期的人文之作中难得的好作品。有一个传闻说钱钟书很不喜欢《浮生六记》,我曾经问过钱先生,他说自己的原话是“不很喜欢”而已,根本不是“很不喜欢”,所以这是一种误传。杨绛先生写了《干校六记》,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浮生六记》的影响。

孙丽华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责任编辑 山木